

重建中國知識體系

■ 呂嘉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退休)

正確認識、解答中國現代化道路所提出的各種問題，必須重建中國文化的人的知識，建設以中國的人的知識為基石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

在有關人類社會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價值判斷比事實判斷更重要。人類社會不同於自然世界：後者的發展、演變形成於自然物質運動，決定於物質運動必然法則，不以人的主觀意願為轉移，也沒有好壞善惡等價值屬性，所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前者則形成於人的自覺建構，不僅具有自然世界所沒有的價值屬性——好或壞、善或惡、進步或落後……，興衰存亡亦同其價值屬性密切相關：好社會是「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1]，人民安居樂業，經濟繁榮，社會穩定，興旺發達，長治久安；壞社會是束縛人的自主活動的「偶然的桎梏」^[2]，民生艱難，

百業凋敝，衰落停滯，危機四伏。因此，人要通過學術研究對社會的發展、演變做出正確的解釋與預測，首先就必須正確判斷社會現象的價值屬性。古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強調：「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識問題，關於正義等等的知識只有從它演繹出來才是有用和有益的。……如果我們不知道它，那麼別的知識再多對我們也沒有任何益處」^[3]。

人的知識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基石。事物的價值是相對於人的存在。價值問題就是「外界物對於人的需要的關係」問題^[4]。人要正確判斷社會的價值屬性，首先就必須正確認識自己，正確認識人。問題是：人人都可以擁有對「人」的個人理解，都可以根據自己對「人」的理解來判斷社會的價值屬性，「公說公理，婆說婆理」，學術研究也就成了無意義的爭論。哲學社會科學要成為造福於人的公共事

業，就必須具備一個基本前提，即某種關於「人」的認識是所有人的共識，是社會公認的人的知識，

摘要：人生存於物質運動法則主宰的宇宙，必須掌握兩類知識，即形成於客觀認識的科學知識與形成於主觀認識的人的知識。人的知識是文化的本體、哲學社會科學的基石。文化創造者集智慧與權力於一身，將自己精神發現確立為承載於信仰的人的知識，引導族群實現從動物到人的轉變。人類在不同文化中成長成人，即成為擁有某種特質（Identity）的人——中國人、西方人……。中國文化的本體是敘述君子信念的知識。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體系逐步淪為西方知識體系的「真子集」，中國人難以認識真實的自己，萌生自我迷失、自我誤解、自我喪失等病態自我意識，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正確認識、解答中國現代化建設面臨問題，必須重建中國文化的人的知識，建設以中國的人的知識為基石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重建承載中國文化的中國知識體系。「知識和權力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誰決定知識是什麼？誰知道應該決定什麼？在信息時代，知識的問題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是統治的問題」。

關鍵詞：人的知識；自我；文化；中國知識體系



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被驗證過的，被人們普遍相信的，可以「通過某種交流手段，以某種系統的形式傳遞給其他人」^[5]。

哲學社會科學形成於西方，西方文化的人的知識形成於西方人的身份認同即宗教認同。「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是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損害這些目的，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6]。這段話不長，所敘述的思想卻極為重要。首先，人為其信仰的造物主所創造。人是什麼？人之為人的準則是什麼？人應當怎樣生活？都來自造物主對人的規訓，記載於宗教經典。其次，人是獨立的個體，稟賦造物主賦予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權利，人的正當生活就是運用自己權利追求自己的幸福。最後，好社會就是保障人運用自己權利追求自己幸福的社會，即以人權、自由、民主為核心價值的社會。無疑，西方文化的人的知識並非人的一般知識或一般人的知識，然而沒有一般的人，只有具體的人、有著特定身份的人，人的普遍本質只能實現於某種具體形式。因此，西方文化的人的知識成為社會科學基石，意味著從此人可以運用科學方法來探索、解決人類社會問題，對文明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事情都有兩面性。西方國家率先實現現代化，但現代化的西方社會並非現代化社會的唯一模式。已故以色列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強調：「現代性確實蔓延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但卻沒有產生一個單一的文明，或一種制度模式，而是產生了多種文明模式，產生了多種社會或文明的發展，這些文明具有共同的特徵，但依然趨向迥異的意識形態動態和制度發展」^[7]。另一方面，不同文明有著不同的價值標準與政治傳統。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指出：「公平正義是從某一政治傳統內部開始的，而且也把作為世世代代長期傳延的公平合作的社會理念看作它的基本理念。它的成員只能由生而入其中，由死而出其外」；「個人觀念是一種

道德觀念，它從我們日常的作為基本思想、沉思和責任單位的個人觀念開始，並適應於一種政治的正義觀念，而不適合於一種完備性學說」^[8]。於是，西方文化的人的知識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基石，西方人判斷社會價值屬性的標準成為了哲學社會科學判斷各國社會價值屬性的價值標準，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就成為西方國家統治世界的「『權力的源泉』，即控制的工具」^[9]；如何構建體現文化多元性的人的知識，「擺脫西方知識的壟斷，或『學術殖民主義』」^[10]，已經是目前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正確認識、解答中國現代化道路所提出的各種問題，必須重建中國文化的人的知識。「中國是一個國家，但它不同於近代的『民族國家』，它是以文化，而非以種族為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或者稱之為『文明體國家』，它有一獨特的文明秩序」^[11]。鴉片戰爭後，中國被動開啟現代化建設，幾經挫折，「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我們終於找到了一條發展自己的正確道路」^[12]。僅僅二、三十年，中國就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就舉世矚目。「從世界的大歷史觀點來看，中國今日可以說是五百年來未有之新局」^[13]。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還在進行中，還有很多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予以研究、解答的實際問題。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無論其成就還是其問題，現有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都還無法合理解釋。張五常先生說：「一個跳高的人，專家認為不懂得跳。他走得蹣跚，姿勢拙劣。但他能跳八尺高，是世界記錄。這個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對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對。那是什麼？在不同的內容上，這就是中國的問題」^[14]。如何才能正確認識、解答「中國的問題」？唯有基於中國的人的知識：我們是這樣的人，我們認為人應該這樣生活，所以這樣的社會條件是我們「自主活動的條件」，所以我們必須這樣組織、治理我們的社會，必須這樣看待、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遺憾的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包括哲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知識，卻唯獨沒有中國文化的人的知識。何謂中國人？中國人何以區別於西方人？中國人之為中國人

的特質 (Identity) 是什麼？已是中國學術界與中國人自己都難以回答的問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中國人要正確認識、解答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各種問題，首先必需重建中國文化的人的知識，清楚知道中國人是怎樣的人。說到底，「國家利益來自國家特性。要知道我們的利益是什麼，就得首先知道我們是什麼人」^[15]；「Identity是想像出來的自我：我們想到自己是什麼人以及我們希望成為什麼人」^[16]。

二

文化的萌芽是主觀觀念——先哲在認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發現了真實的自己，或者說，只能確證於人的生命的人的真理。文化的創造者是集智慧與權力於一身的族群領袖。他們將自己的精神發現確立為族群的共同信仰，引導族群成員實現從動物到人的轉變。文化的本體即承載於信仰的人的知識。

進化論揭示：人類起源於生物進化；但作為一種動物的人類如何發展為不是動物的人？進化論又不能合理解釋。有關靈長目動物進化的研究發現：「人類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在進化上有最多失敗的物種：在過去的600萬年間，猿這個物種的數量急劇下降，特別是與我們的近親猴子相比」^[17]。一百年前，恩格斯提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18]，遠見卓識。作為一種動物的人類不會通過生物進化途徑而直接轉變區別於動物的人，人只能誕生於自己的創造性活動。當代人類學發現，人類在從動物轉變為人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個非自然性的關鍵因素——文化。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茲指出：「文化不是被附加在完善的或者實際上完善的動物身上，而是那個動物本身的生產過程的構成因素，是核心構成因素。……人類的神經系統不僅使他們能夠習得文化，而且，如果神經系統要發生任何作用的話，還可能要求他們去習得文化。與其說文化的作用僅僅在於補充、發展和延伸在邏輯和遺傳上先於它的以生物體為基礎的能力，不如說它更像是這些能力本身的組成部分。事實會證明，沒有文化的人類將可能不是內秀但未完善的猿，而是完全無智力從而不中用的畸形」^[19]。因此可以

說，創造人本身的勞動包括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而創造出文化的精神勞動則在人的創生過程中發揮著更為關鍵性與決定性的作用。

人類神經系統為什麼必須習得文化才能發揮作用？或者說，在物質生活資料極其匱乏的遠古時代，人類為什麼要從事精神勞動，去創造不能吃也不能穿的文化？根源在於，人類在生物進化中萌生了精神與精神需要。目前已知，動物有意識，卻還沒有精神——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意識。一些高等動物也可以從事分析與綜合、比較與分類、抽象與概括等複雜的思維活動。「烏鴉和黑猩猩都能夠進行高度智慧的行為，而且可以在野外利用樹枝和樹葉製造工具。烏鴉還能解決決策問題和新異問題」^[20]。但動物還沒有自我意識，思維的主體還是其大腦，而不是大腦中的我。美國生物學家多布贊斯基認為：「自知是人類的根本特徵之一，可能是最根本的特徵。……迄今為止找不到高等動物具有內省或自我意識的證據，但它們看上去的確具備了感知、情感、記憶、意向甚至思考等精神屬性」^[21]。這就是說，動物還不能從「我」的角度看待一切，還沒有精神——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意識即我從「我」角度去觀察、思考進而做出決定的意識。人類何以在進化中萌生自我意識？還是科學的未解之謎。諾貝爾獎獲得者、澳大利亞神經生理學家埃克爾斯推測：「極為漫長的生物進化過程中，一扇通向未來的窗戶只開啟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其間原始人類這一支從人科動物的進化路線分離了出來，經南方古猿而最終變成人。……原始人不僅有意識，而且萌生了人類的自我意識」^[22]。人類可以意識到自己，意識發展成為具有了主觀能動性的精神，也產生精神的需要：不是對於可獲得情感滿足的娛樂、遊戲的需要，而是對於有關真實的自己、真實的我的觀念的需要：人的一切自覺生命活動都決定於自己，因此也必須知道我是什麼，何謂真實的自己，否則生命就沒有意義，精神就會空虛、迷茫、困惑、苦惱、焦慮、煩悶、抑鬱……，即便衣食無憂也仍然了無生趣，毫無人生幸福可言。一句話，人是物質與精神的辯證統一體，人的精神需要與物質需要都是必須滿足的基本需要，所以人類必須從事精神勞動，生

產滿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產品。

物質勞動艱苦，精神勞動艱難。人要通過精神勞動生產出滿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產品，首先就必須正確認識自己，然而人認識自己的道路卻深邃幽暗，處處歧路，一旦深入，猶如墮入專門吞噬人類才智的「意識黑洞」。囿於西方哲學的傳統範式——把世界萬物歸結為某種本體以解釋世界的哲學範式——的哲學，雖然也從事有關我的研究，卻永遠無法提供可以充分滿足人們精神需要的精神產品。人稱自己為「我」，認識我，就是認識人。基於唯心主義哲學的觀點，將我將其歸結為獨立於物質的精神，雖然肯定人是自己的主宰，卻難免妄自尊大，不自量力，四處碰壁。基於唯物主義哲學的觀點，將我歸結為某種客觀實在的主觀映像，似乎可以通過發現客觀實在的必然法則而把握自己，其實卻意味著自己將自己歸結為某種必然法則決定的物。毋庸諱言，如果基於目前唯物主義哲學的意識定義——「意識的物質世界在人腦中的主觀映像」^[23]——認識我，必然陷入理論上的自相矛盾：我是意識，是現實中某物質實體在人腦中的主觀映像；現實中作為物質實體的我是真實的我，我不是意識。追根溯源，人是精神與物質的辯證統一體，既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精神，也不能簡單的歸結為物質，將一切存在——人與物——都歸結為某個本體、本原，也就不可能正確認識人，不可能正確認識自己、不可能正確認識我——人稱自己為「我」。

人可以通過科學去探索宇宙萬物的本質與規律，我卻永遠在科學的視野之外。客觀是科學研究的首要原則。我卻是我從「我」的角度所看到的自己。對於人自稱為「我」的那個人，他人稱其為你、他或其他什麼。我一旦作為客觀對象即人從「他」的角度所觀察的對象，也就成為了你、他或其他什麼，而不再是我。現實世界中永遠不會存在所有人都稱之為我的物質實體。在人腦中形成同我有關的主觀映像的物質實體，並不是我本身，而是我的身體，所以《三國演義》中曹孟德假借夢遊中殺了自己的衛士，卻可以言之鑿鑿地強調殺人者並不是自己。因此，人在科學研究中看不到自己，我永遠在科學視野之外。我是唯一的。佛陀說：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古往今來，億萬眾生，每一個我都是唯一的，每一個人的人生都不可重複，都有著僅僅屬於自己的經歷與感受、關注與思考、想像與創造。人類大腦的物理過程如何引發宇宙中唯一的主觀性體驗？科學越發展，人對大腦與意識的認識越深入，也就越發為此而困惑。英國心理學家布萊摩爾說：「一方面，對於握住鉛筆這件事而言，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個人體驗，這種體驗只有我們自己知道；而在另一方面，世界中的確有真實存在的鉛筆。那些不可分享的、個人的感覺又如何能夠和空間中真實存在的物體聯繫在一起呢？……即使憑藉我對大腦功能的所有理解，我仍然不能夠明白本質上主觀的、個人的和不可言說的體驗如何能夠從真實存在的鉛筆和活生生的腦細胞這樣一個客觀世界誕生」^[24]。對於經驗科學，「從大腦的物理現象到與之相對應的意識事實之間的通途是無法想像的」，因此「關於在大腦中的物理過程如何引發宇宙間唯一的主觀性體驗的問題」，也就成為當代心靈哲學無法解答的「難題」^[25]。近年，計算機科學發展迅速，然而「所有元數學和計算機理論的限制性定理都說明。你永遠不能完整地表示自己。……尋找關於自我的知識就像踏上了這樣一條路途。它永無盡頭，它不可描述」^[26]。

精神勞動者何以能夠正確認識自己，解決人類智慧面臨的最大難題？首先，「古之學者為己」《論語·憲問》。精神勞動者因自己精神的饑渴、苦悶而從事追問自我的精神探索，並非為解釋世界而追問一切。他們的思想自由無羈，不為任何教條所束縛，同時也有著明確的目標與界限，不會為知識而知識地沒完沒了地追問，正如雅斯貝爾斯論述孔子等作為思想範式創造者的偉大思想家：「他們對形而上的思辯、自然科學毫無興趣。對他們來說，有更廣闊的領域是他們根本不願去知道的。……他們所強調的無知卻是他們的根本界限。在知識無法達到的地方，不應等浪費時間做沒有結果的思考。甚至在重要的問題上，知識也不是必須的，如果靈魂的救贖不完全依賴於它的話」^[27]。其次，精神勞動者因心靈的饑渴而從事精神探索，因此他們的精神探索也並非僅僅訴諸理性的思考，

更重要的，而是訴諸心靈的追問與判斷。心靈是人的精神的器官，有著反映、表達、感知人的精神狀況的獨特能力。人類語言顯示，人的精神狀態極其複雜、微妙，是作為物質器官的大腦的感受所永遠無法反映的，唯有反映為心靈的感受：心安、心定、心靜、心慌、心亂、心寒、心虛、心驚、心動、灰心、會心、虧心、心亂如麻、心有靈犀、心悅誠服、萬眾一心……。經驗科學的確無法確證心靈的存在，但任何人都不會說自己沒有心靈，因為那就等於自己承認自己不是人，不具備人的精神感知能力。在現實生活中，人的精神需要既表現為心的感受——心靈饑渴、心煩意亂、心灰意冷……，人也唯有訴諸心靈的感受——內心滿足、內心安寧、心曠神怡、心安理得……，才能知道自己精神需要已經得到了滿足，從而才能準確判斷自己精神勞動產品的正確與錯誤。荀子說：「人何以知道？曰：心。……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荀子·解蔽》）。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訴諸心靈，精神勞動者也就擁有真正的自信——信心，堅信自己心靈的選擇，因此他們也就擁有了人的最高智慧，追問自我卻不以自我為單純的認識對象，從而發揮出自我意識賦予人類的最高能力。說到底，我、自己標誌著一種能力，人類從動物轉變為美國人類學格爾茨所說的人——「要靠自我完善的動物」、「自我實現的行為主體」^[28]——的能力：自己形成於自指——自己指稱自己，因此自己以鏡像形態存在：我是唯一的，卻不是孤立的，而是鏡像形態的：我在，就有一個作為我的鏡像的「我」也在；「我」在，就有一個作為「我」的鏡像的『我』也在……；我知道，就一定有一個知道我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一定有一個知道「我」知道我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此，我是什麼？只有「我」可以知道；只要我相信「我」，我就可以讓「我」定義我，我決定以我的生命踐行「我」對我的定義。最後，真正的精神勞動者是真實的我的真理的探索者，也是自己所追求真理的身體力行者。「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他們並不用理論方式研討這個問題，而是用實踐來回答」^[29]。一句話，他們

追問自己卻不以自己為單純的認識對象而將生命荒廢於沒有止境的追問，而是一旦認定自己發現了真實的自己，就立即以自己的精神發現定義自己，以自己的生命踐行自己的精神發現，讓真實的自己展現於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真實生命確證了自己精神發現的客觀真理性，因此也超越了「認識自己」的悖論，成為歷史上最先實現從動物到人的轉化的人。我是人的自稱，我的真理就是人的真理，只能見證於人的生命的真理，而非可以脫離人的生命的抽象原則。人類起源於生物進化，生而固有動物本能卻又可以區別於動物，就在於人有動物本能卻可以不屈從於動物本能，而是以自己發現的、自己的真理為自己生命的準繩。雅斯貝爾斯在論述孔子等先哲時強調：「最為關鍵的東西並非這四位大師的著作或內容，而是他們生命的真實性，這是人類在世間轉化的起點」^[30]。

文化的本體是承載於信仰的人的知識。集體生活是人類賴以生存、繁衍的基本方式。最先實現從動物到人的轉變的精神勞動者，如果不能將其頭腦中的主觀觀念轉變為族群公認的知識即人的知識，通過知識傳授途徑引領其族群同胞也完成這一根本性轉變，他們的精神發現也就失去了意義。然而人的知識完全不同於人們所熟知的科學技術知識或記敘社會歷史事實的社會歷史知識等。後者形成於人的客觀認識，其真理性確證於眾人參與的公共檢驗；前者敘述人是什麼、人的準則是什麼、人應當怎樣生活等，形成於人的主觀認識，人只能通過自己的生命踐行來確證其真理性。後者是人的工具，人是否學習這些知識，在生活中是否運用這些知識以及怎樣運用這些知識，都決定於自己，沒有一定之規；前者敘述人之為人的絕對真理，人唯有身體力行，以為自己生命準繩，否則就只是毫無意義的主觀觀念。因此，先哲個人有關人的正確認識發展成為社會公認的人的知識，也就意味著人類族群確立了共同的信仰——融主觀確信與生命準繩於一體的意識形式，意味著人類族群建構起以信仰為核心的精神世界。顯然這極為艱難。人有自我意識，人人都有認識自己的意識能力，都希望自己的自覺生命活動決定於自己，從而都有理由質疑、拒絕他人所發現的人的真



理。雅斯貝爾斯說：「真理的確存在於這樣一個悖論裡：在人類的生命走到盡頭時，真理必須真正存在於形式和範圍之中，而這一切又是以如此短暫的生命和如此有限的意識為其界限的。這一整體不可能長於人的生命的幾十年，超過人的精神能量，勝於人類經驗的豐富，以及逾越人類的理解能力」^[31]。人類如何超越雅斯貝爾斯所說的悖論，完成從動物到人的轉變？經驗科學永遠無法確證。當代法國哲學家利奧塔爾提出：「知識和權力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誰決定知識是什麼？誰知道應該決定什麼？……科學知識並不是全部知識。……它總是處在與另外一種知識的競爭與衝突中。為了行文的方便，我們把後一種知識稱為敘述性知識。……在傳統知識的表達中敘述形式佔主導地位。……敘事的傳統同時也是標準的傳統，這些標準的傳統界定了三種能力，即話說能力、傾聽能力和做事能力」^[32]。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孟子》）。在漢字中，「聖」的繁體字是「聖」，由耳、口、王等三個字組成，指以耳聽天意與民意，以口表述天意與民意的族群領袖。引導人類族群實現從動物到人的轉變的，或許就是孟子所說的聖人。他們擁有真正的智慧，在認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發現了真實的自己，或者說，發現了必須能顯現為人的生命存在的我的真理，從而是最先實現從動物到人的轉變的人；同時也是掌握族群最高權力的族群領袖，因憂慮仍困惑於自己的族群同胞而運用手中的權力，將自己發現的真理確立為族群的信仰，要求族群同胞確信人的知識是人的絕對真理，必須堅信不疑並身體力行，以為自己的生活準繩。有必要指出，族群領袖所以能夠運用權力確立族群信仰，前提是人類有必須滿足的精神需要——認知自我的需要。人的知識就是滿足人的精神需要的精神食糧，或者說，引導、規範人的意識從而使人得以認識真實的自己的思想範式。信仰是一種意識逐步萌生、確立於精神需要的滿足：真實的我就是真正的人，人的真理就是我的真理，唯有堅信不疑並身體力行，以為自己生活準繩。信仰確立的過程即精神世界的建構過程。精神世界之所以區別於物質

世界，就在於精神世界以作為意識的我為基石，擁有區別於物質世界的獨立法則。人有信仰，不僅在於擁有一種主觀確信，更重要的，是擁有正常的精神生活與健康的精神世界，成為能夠自覺控制自身精神與物質的矛盾的人。由此，精神勞動者為滿足自己精神需要而生產出來的精神產品，演化為培育人類成長成人的文化。「文化就是這樣一些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33]。原始文明形成於圖騰信仰。人生而為氏族部落的成員，無條件地接受氏族部落的圖騰信仰，人的知識隨生命成長而逐步融入人的生命，成為超越本能的生命準繩，從本能支配的自然個體轉化為合格的氏族部落成員即以自己生命踐行人的知識的人，在生命成長中自然完成。從此，「成為人類就是成為個人，我們在文化模式的指導下成為個人；文化模式是在歷史上產生的，我們用來為自己的生活賦予形式、秩序、目的和方向和意義系統」^[34]。最初的人的知識還是狹隘的，帶有人類脫胎而出的動物性，人類學家在考察中發現：血緣、地域都會成為人與非人的界限：「『做一個人就是做一個爪哇人。』小孩、鄉巴佬、傻子、瘋子、道德敗壞者，都『還不是爪哇人』。一個有能力按照非常繁雜的儀式系統行動的『正常』的成年人，具備音樂、舞蹈、戲劇和紡織品圖案的精妙的美感，能對居於每個人的內在意識中的神靈的微妙提示做出應答，就『已經是一個爪哇人』」^[35]。

世上多數文化都孕育、成型、維繫於某種宗教，以其宗教標誌文明的個性特徵，並非偶然。人的知識承載於信仰，宗教信仰是信仰的天然形式，宗教信仰傳承是文化傳承的天然形式，猶如黃金是貨幣的天然形式。文化是人類最具原創性的精神創造，卻並不承載於人類生物遺傳基因。先人智慧，發明文字，以文本形式記敘文化精髓並以為族群世代的經典。文化傳承的基本途徑是人的知識的世代傳承。另一方面，人是精神與物質的辯證統一，人的精神世界是信仰與理性的辯證統一。文明越發展，人的變革物質世界的能力越強大，人也就越是依賴並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越要質疑形成於主觀觀念的信仰。宗教現象學認為：「對宗教的任何學術研究都應該探討拯救問題，……因為它

定義了宗教自身的目的」^[36]。宗教社會學認為：「宗教植根於一個基本的人類學事實：人類有機體對生物本能的超越」^[37]；「宗教可以定義為一種信仰和實踐的體系」^[38]。按基督教的理解，宗教起源於上帝，目的是拯救，《聖經》中說：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聖經·約翰福音》）。宗教信仰者所信仰的上帝，並非以無限力量主宰萬物而讓人類不能不匍匐於其腳下的神靈，而是人本應如此，集一切美德於一身的「人」的典範，即形象化的人的真理。人皈依宗教信仰，就直接領悟人的真理，滿足認知自我的精神需要，獲得超越本能的生命準繩。德國哲學家西美爾所說：「我信仰上帝，那麼，這就意味著，這種信仰與我堅信存在著以太、月球能夠住人、人的本質永遠不變等完全是兩回事。這不僅是說，上帝的此在雖然不可確證，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時，也意味著……我把上帝當做生活的準繩」^[39]。因此，宗教信仰傳統是文化傳承的重要保證。當代西方國家擁有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西方文化的本質規定仍形成於其宗教，西方國家核心價值仍根植於西方人民的宗教信仰。在當代西方知識體系中，宗教知識仍然佔據重要位置，作為神聖與拯救的知識而與效能知識（作為科技知識的實證知識）、教養知識（文史哲知識）鼎足而立^[40]。

多樣性是人類文化的現實形態，也體現了人類文化的本質屬性——個性。人是文化的創造者。文化的個性源於人的個性。在很多哲學辭典中，個性都被等同於特殊性，其實兩者並不相同。特殊性是物的屬性，並且是物的非本質屬性。這片樹葉之為這片樹葉的特殊性被改變了，被另一種特殊性取代了，這片樹葉仍是樹葉，樹葉的本質沒有改變。人的個性卻是人的本質屬性。一個人如果喪失了自己的個性，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他的生命就不屬於他自己，他就不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人，只是一個從屬於其他存在的存在，所以馬克思說：「無產者，為了實現自己的個性，就應當消滅他們迄今面臨的生存條件」^[41]。文化創造者們對真實的我或人的真理的認知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他們所發現的真實的自己，他們以思想言行乃至全部

生命所彰顯的人的真理，又體現著自己的鮮明個性，因此他們「實現了人類終極的各種可能性，但在內容上並不一致」^[42]。一定人類族群在一種文化中成長成人，其先哲頭腦中的「我」也就成為了規範其族群同胞自我意識的精神範式，無數擁有自己獨立意識的個人凝聚為人類世界中的「我們」，因此擁有獨特精神追求與精神氣質。人類在一種文化中成長成人，這種文化就是滿足其精神需要的主要精神食糧。人們學習自己文化的經典，就是認識自己，回答人永遠需要回答的「認識你自己」的問題。

文化的生命承載於人的生命。文化的本體是承載於信仰的人的知識，人有信仰，人的知識所敘述的人的真理就是人的絕對真理，人對人的真理堅信不疑並身體力行，人的自然生命也就成為了人的知識的物質載體，人類生命的延續也就意味著文化的發展與創造，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發展出豐富多彩的文化樣式：宗教、哲學、服裝、建築、飲食、詩歌、音樂、繪畫、娛樂……。文化發展成為文明——「最廣泛的文化實體」^[43]。人群繁衍傳承文化，文化傳承形成文明歷史，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每一種文化都是一個獨立的「我」，擁有自己的獨特個性，因此也擁有一次不可再生的生命，一旦生命終結，也就永遠不會再產生出來。文明歷史顯示：任何一種生產關係、生產方式、政治制度、社會意識形態乃至社會形態的歷史都僅僅屬於一定歷史階段，文化的生命卻可以同文明歷史一樣長久，超越多種社會形態的變革。公元1世紀猶太民族失國於羅馬人，20世紀中葉重建以色列國。近兩千年中，猶太人民散居世界各地，猶太文化並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與政治建構，唯有猶太人民始終不渝的猶太教信仰，但猶太文化卻因此生命延續，猶太民族也終有機會重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指出，歷史上曾存在過很多種文化，但多數都已滅亡，只留下散落於荒野的古跡與陳列在博物館中的古籍、文物。說到底，人的知識是人腦中的主觀觀念，所以能夠長期存在於物質運動法則主宰的宇宙，就在於人確信其為人的絕對真理，自覺以為自己生命準繩，從而承載於人的物質生命；一旦人質疑人

的知識是否真理，不再自覺自願以其為自己的生命準繩，人的知識也就退化為人腦中的主觀觀念，隨時都會在宇宙中消失。

三

中國文明是世界諸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明——已故以色列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稱其為「專注於現世的文明」^[44]。從古到今，多數中國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中國文化的本體即敘述君子信念的知識。人在中國文化中成長成人，也就意味著人的精神成長規範於君子信念，作為人而成為中國人——具有中國人的特質 (Identity) 的人。

在中國最古老的文獻如《尚書》、《易經》、《詩經》中，先哲就以「君子」界定自己，確認真實的我就是君子，君子就是人的真理的生命形態，確立了中國人特有的信仰形式——君子信念。所謂信念，指人「對理論的真理性和實踐行為的正確性的內在確信。……以目的、動機的形式貫穿在人們的實踐活動中，並與情感、意志相結合，形成一種穩固的觀念意識支配人們的行動。理論對信念的形成具有決定的作用」^[45]。就是說，信念同信仰一樣，都是融主觀確信與生命準繩於一體的意識形式，都奠基於相應的世界觀理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清晰闡述中國先哲在深入思考人與物、我與他、自我與生命、文明與自然等辯證關係基礎上形成的世界觀理論：世界萬物遵循自然法則，萬物運動具有任何力量都不可改變的必然性；我以君子為人生準繩，我作為人的生命就如天地運行般剛勁強健，所承載文明亦生生不息。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思想家從各自角度重新認識自我：道家的「君子」超然物外，自然遂性，獨善其身；墨家的「君子」勇武、俠義、實幹、有為；法家的「君子」抱法處世而治；儒家學者繼承並弘揚君子信念的傳統：《論語》以「仁」概括君子的本質並以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仁」字由「二」字和「人」字組成，形象地表現了中國先哲對於人的深刻理解：人是什麼？人不是可以孤立存在於宇宙間的生命個體，而是存在於人與人之中的獨立個體；人如何作為人而存在？在於人要使每一個人都作為人而存

在。君子是「仁」的自覺者與踐行者：「為仁由己」(《論語·述而》)，「仁以為己任」(《論語·泰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成人即成己。「仁」是好社會的原則，也是判斷社會價值屬性的準則：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位置，每個人也都相應承擔著自己的職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好社會是使人作為人而存在的社會，以德為本，無須將「自由」規定為人的權利，只要自覺遵循合乎「仁」的言行規範，人人都是自由的，都可以堂堂正正地自主決定自己的生命活動。好社會使人可以堂堂正正作為人而生活的社會，人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物質生活條件的提高、改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同時擁有財富也就意味著肩負了對他人與社會的責任，否則就是為富不仁，為世人所鄙視。「仁」是永恆的，其內涵可以隨社會分工的發展而無限拓展，好社會的構建、維護離不開仁人志士世代代「仁以為己任」的奮鬥、追求：堅持真理，追求正義，果敢堅毅，無所畏懼，「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永不懈怠，永無止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章》)。說到底，在物質運動法則主宰的宇宙，人作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不可能」——人以物質形態存在，卻擁有自己決定自己自覺生命行為的自由，唯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種「不可能」才可能轉變為現實，即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強調：「人不能夠真正自由或倡導真正的自由，除非他承認，在現實世界以上有一超越的境界，並生活於其中，而生活在與天主的關係裡，因為自由永遠是按照造物者的肖像而受造的人之自由」^[46]。人的教育是好社會的根本，也是君子的社會職責：言傳身教，以身作則，引導人作為人而成為人。先哲智慧，洞悉人的精神世界：你是人，真實的我就在你心中；無須解釋，無須論證，你亦不會質疑；但你要成長成為真正的人——君子，又需要正確的引導，使真實的我不斷鞏固、強化，最終形成堅定的君子信念——時刻審視自己思想言行的生命準繩。《論語》只討論何謂君子，何謂小人，人如何成為君子，並不探討人為什麼一

定要成為君子，人為什麼一定不能成為小人。《孟子》以心、性等範疇闡發「仁」的思想內涵，進一步明確教育對於人的重要意義，「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三字經》）；同時以盡心、知性為本，奠定了融知識學習、信念教育、文化傳承於一體的中國教育模式。對於中國人，學習《論語》、《孟子》等儒學經典，並非只是青少年讀書期間的事情，而健康人生的必要部分——中國人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形式：「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中國人在儒學教育下成長成人，君子信念傳承於知識傳授，人人以為天經地義，毋庸置疑，「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舉賢良對策》），人無需崇拜、信仰任何外在於自己的神靈即可獲得超越動物本能的生命準繩。因此，中國古籍中罕見「信仰」一詞，艾森斯塔特亦特別強調：「在中國傳統的信仰體系中，超越秩序與現世秩序之間的緊張是用相對世俗的術語表述出來的，也就是根據一種形而上的或倫理的——而不是宗教的——區別表述出來的」^[47]。

中國哲學即中國人的世界觀理論——從「君子」角度看待世界的世界觀理論，或者說，系統闡述、論證君子信念的哲學。中國的君子信念同其他文化的宗教信仰一樣，既是人的主觀確信，永遠不能為經驗科學所確證，但也並非沒有真實根據的盲目、迷信，而是根源於先哲的自知之明，形成於系統的世界觀理論。中國歷史上沒有哲學這樣一門學問。就文明教化功能及其在文化中的地位而言，《論語》、《孟子》等儒學經典所闡述的世界觀理論，近似其他文化中的宗教：闡述先哲為人確立的規範並以為人的知識，通過人的知識傳授而引導其族群同胞的自我認知，使其作為人而成為人。所以，辜鴻銘說：「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代宗教，使人們不再需要宗教」^[48]，目前國內外學術界也還有一些學者稱儒學為儒教，稱中華文明為儒教文明。就理論形態、傳承形式等而言，儒學經典所闡述的世界觀理論又近似起源於古希臘的哲學——建構於高度抽象的形而上範疇，傳承於訴諸理性的知識學習，從而人們又稱中國人的世界觀理論為哲學。美國學者古德諾說：「中國人與其

說是一個宗教的，不如說是一個哲學的種族。他們很少意識到自己與創世者的關係（中國人以一種被稱之為哲學的思想體系來規範人們的日常行為，調節人與人的關係）」^[49]。另一方面，作為闡述君子信念的世界觀理論，中國哲學立足於先哲的自知之明，從而不同於追求解釋世界萬物的西方哲學。馮友蘭先生指出：「哲學在中國文化中所佔的地位，歷來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照中國的傳統，研究哲學不是一種職業，每個人都要學習哲學，正像西方人都要進教堂。學哲學的目的，是使人作為人而能夠成為人，而不是成為某種人」^[50]。金岳霖先生強調：在中國，「哲學從來不單是一個提供人們理解的觀念模式，它同時是哲學家內心中的一個信條體系」；對於中國哲學家，「他的哲學要求他身體力行，他本人是實行他的哲學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學的一部分」^[51]。在中國，哲學家並不以哲學研究為職業，而是教育育人的教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師者」（韓愈：《師說》）。言傳身教，以身作則，是中國哲學家的職責。「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中國哲學以人的自知之明為本，缺乏追問萬物之究竟的動力，沒有形成本體論、認識論，沒有成為孕育科學的搖籃。

「中國文明秩序的核心是其政治體系」^[52]——根植中國文化的、以德為本的精英政治體制。原始社會解體以來，文明社會就構建於人與人之間無法消除的利益矛盾之上，因此必須組織成為政治社會，依靠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來確立、保障、維護社會秩序。怎樣的政治制度才是正義的，才能保障社會的長治久安？始終是各國哲學家、思想家關注的重要問題。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強調：正義的政治體制根植於人民「世世代代長期傳延的公平合作系統的社會理念」^[53]。中國文化「以道德代宗教」^[54]。中國先哲確信君子是真實的自己，亦是社會中堅，「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篇》），因此也奠定以德為本的、中國人世代傳延的公平合作的社會理念。三千年前的殷周制度，「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之團體」（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奠定以德為本的精英

政治：一是執政者與民眾的關係並非僅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單純政治關係，而還包含人與人之間相互負有道德責任的道德關係，所謂「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禮記·表記》）。一是執政者必須是有德之人，「內聖外王」是中國古代各思想流派的共同理想，大家確信：內備聖人之至德，施之於外，才可為善政。中國人心目中的好社會體現著中國人的最高價值——「仁」，即是由最優秀的人即「仁以為己任」的人所治理的社會。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學教育是人的教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也是名副其實的精英教育——「仁以為己任」者就是中國人的精英，他們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自己的人生理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社會上上下下都尊重讀書人，推崇道德文章，「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科舉制度是國家選拔治理社會的精英人才的重要制度。隋唐以後，歷朝歷代均開科取士，以考生掌握儒學經典程度錄用官員。人類社會應當由最優秀的人治理，自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就是眾多西方思想家的政治理想，科舉制度則將這一理想變為現實，並至今造福於人類。有必要指出，中國古代社會並非西方學術話語中的封建社會，雖然沒有人權、自由、民主、公民等政治概念，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社會公認的基本規則，「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是社會公認的政治理念；「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國家政治並非只屬於特定社會階層的貴族政治、專制政治。貧寒子弟亦可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社會公認的精英，治理國家的政府官員，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歷朝歷代，不乏出身寒門的名臣、名相。另一方面，「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身無半畝，心憂天下」（左宗棠），「處江湖之遠憂其君，居廟堂之高憂其民」（范仲淹），是社會公認的政治美德，同時也形成諸如「公車上書」這類重大政治事件，深刻影響著中國政治的實際運行。當然，精英也會腐化、墮落，選賢舉能同樣也會演變為任用私人，結黨營私，精英治理也會蛻化為奸佞專權，黨同伐異。但這是另外的問題。沒有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任何社會環境都不會讓人自動成為完美無缺

的聖人；人類社會的發展、完善同人的發展、完善一樣永無止境。

承載中國文化的知識體系是「經史子集」。「經」指《論語》、《孟子》等儒學經典，敘述中國的人的知識，闡述真正的人即君子的準則——仁、義、禮、智、信，敘述中國人的世界觀理論——從「君子」角度看待人類世界的世界觀理論。「史」並非現代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科學，而是中國文明的終極評價體系，「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過零丁洋》）。修史是政府職責，前朝史後朝修。老百姓沒有機會進入國家正史，就自撰家譜、族譜；人生短暫，但以生命承載文化，人人都是文明中的永恆。「子」即百家之說，記敘中國人的精神探索；「集」為詩歌、小說、散文、筆記等所結文集，展現中國人的生活與情感、理想與追求。千百年來，中國人在中國文化中成長成人，就是在君子信念引導下成長成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卻同樣擁有可以為之犧牲一切的崇高精神：「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永遠「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55]。中國文化承載於族群繁衍，生命頑強而堅韌。

四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體系逐步淪為西方知識體系的「真子集」，君子信念成為沒有根據的主觀觀念，中國人難以認識真實的自己，萌生自我迷失、自我誤解、自我喪失等病態自我意識，進而影響、阻礙甚至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正確認識、解答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種種問題，必須重建中國文化的人的知識，建設以中國的人的知識為基石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重建中國知識體系。

人類作為人而生存於物質運動必然法則主宰的宇宙，必須擁有兩類完全不同的知識——形成於客觀認識的科學知識與形成於主觀認識的人的知識。人的物質屬性在於人的生命的物質性，物質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物質生活是人的日常生活的首要部分；因此人必須掌握正確反映物質運動規律的科學知識，從事變革自然萬物的物質勞動，

獲得自己所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確保自己正常的物質生活。人的精神屬性在於人有自我意識，一個人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決定於人腦中的意識——我。人的精神需要——我對於有關真實的我的思想觀念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人的精神生活即人攝取自己所需要的精神產品的生命活動是健康人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人必須從事精神勞動，生產出自己所需要的精神產品——人的知識，確保自己正常的精神生活。科學知識形成於人對宇宙萬物的客觀認識，其真理性確證於公共檢驗；人的知識形成於先哲認知自我的精神探索，其真理性確證於人的生命。科學知識敘述相對真理，隨著人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深入而不斷發展；人的知識敘述人之為人所必須確信的絕對真理——人是什麼、人的準則是什麼、人應當怎樣生活等，是人作為人就必須永遠堅信不疑並身體力行的絕對真理，人之為人的根本，文化賴以維繫、傳承的根本——舍勒稱其為神聖與拯救的知識，利奧塔爾稱其為敘述性知識。在狩獵時代與農耕時代，人類有關物質運動規律的客觀知識主要凝聚於生產的經驗與技藝，故而利奧塔爾強調：科學知識「曾經是多餘的」^[56]。「經史子集」曾是完善的人類知識體系，因此也成就了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莊子·齊物論》。隨著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最先掌握這些知識的西方國家迅速崛起，「經史子集」中沒有系統探索物質運動規律的科學知識，中國難以抵禦西方列強的衝擊。當然，無論科學技術如何發展，人的知識仍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文化、文明賴以存在、維繫的根本。「科學知識並不是全部知識。如果不求助另一種知識——敘事，科學知識就無法知道也無法讓人知道它是真正的知識」；「判斷真理的權利與判斷正義的權利是互相依存的」^[57]。所以，西方文明仍以宗教標誌其本質特質，神聖與拯救的知識仍是西方知識體系的重要構成，仍是奠定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之根本的基石。

當代中國知識體系僅是西方知識體系的「真子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為追求現代化，解構

「經史子集」，依據西方的學科制度重建中國知識體系，在獲得現代化建設不可或缺的科學知識的同時，也越來越迷信科學，逐步喪失了對自己文化的自覺、自信。學科制度的思想基礎是唯物主義世界觀：世界萬物本原於物質，運動是物質的存在形式，決定於物質固有性質；規律是事物本身固有因素間的本質性聯繫，規定著事物發展、運動的方向、道路與途徑；事物遵循其規律的發展、運動，具有不可改變的必然性；人只要掌握了事物的本質與規律，就可以「根據世界在某一時刻的狀態，……無歧義地得出它的過去和未來的其他一切狀態」^[58]。科學知識形成於對宇宙萬物分門別類的實證研究。學科指科學知識的分支——「學科是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59]。當代中國知識體系按學科知識分類，包括理、工、農、醫、文、史、哲、經、法、教育、管理、軍事、藝術等十三個門類，其中所有知識都是屬於全人類的科學知識、學科知識——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與作為自然科學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的概括與總結的哲學知識。《論語》、《孟子》等中國文化經典雖然仍散存於文、史、哲等不同學科，但不僅已經喪失敘述中國人以為天經地義的人的真理的知識功能，而且還要為新的知識標準重新評價其作為知識的意義。另一方面，在當代中國知識體系中，哲學、歷史學、文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新聞學等學科公認的價值標準——自由、民主、人權等，都根植於西方人的身份認同即宗教認同：「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共產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也還是西方價值觀中的個人自由——「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60]。因此，無論當代中國學術界在主觀上怎樣看待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實際上，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與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同根同源，都以西方文化的人的知識為基石。所以說，當代中國知識體系僅是西方知識體系的「真子集」，全部知識僅相當於西方知識體系的部分知識——效能知識與教養知識，全部知識生產也只是在發展、完



善西方知識體系的部分知識——效能知識與教養知識。鄭永年說：「中國知識體系的狀況，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思維、思想被殖民狀態」^[61]，並不過分。反思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除了馬恩毛鄧，就是德（亞里士多德、康德、薩義德、龐德、赫爾德、柯林伍德）、爾（海德格爾、卡西爾、黑格爾、托克維爾、韋伯[爾]、貝爾、波斯納[爾]）、克（哈耶克、洛克、諾奇克、克拉克、布萊克、拉塞克）、斯（諾斯、科斯、霍布斯、羅爾斯、哈貝馬斯、吉登斯）。這就是三十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為當代奠定的閱讀和研究語境，是我們思考和回答『中國問題』的起點和歸宿」^[62]。也正因此，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同西方哲學社會科學一樣不能正確認識、解答「中國的問題」，並且形成一種中國特有的荒謬現象：學術越發展，具有原創性的學術成果就越稀缺；學者的思想越自由，學術界的思想就越匱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文學科原創作品的影響日漸衰退。以十年為計，三個十年間稱得上影響學界的人文作品分別為90篇，49篇和70篇，約佔被引文獻總數的60%、25%和15%」^[63]。說到底，文明世界以人為核心，形成於人的自覺建構、自覺維護；人無自知，連自己是什麼人都不清楚，又有什麼資格討論文明社會應當如何構建，如何治理？

中國知識體系成為西方知識體系「真子集」，作為中國文化本體的人的知識——敘述君子信念的知識——成為了沒有知識功能的知識碎片，不再提供滿足中國人精神需要的精神產品，中國教育因此傳授知識卻不再傳承文化；文化傳承斷裂導致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機，以至形成種種病態自我意識，產生出種種直接影響、干擾、遲滯甚至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問題。

首先，迷失自我，信仰危機，道德滑坡，進而導致「社會潰敗」^[64]。信仰形成於人的主觀確信——我對真實的「我」的確信。對中國人來說，中國知識體系成為西方知識體系「真子集」，除非信仰某種宗教，否則「我是什麼」就是無解的問題，或者說，普通人望塵莫及的、當代哲學尚未解決的哲學前沿課題。億萬中國人困惑於「我」，社

會上下陷入信仰危機、信念危機。有資料顯示：「58.33%的被調查者表示沒有信仰」^[65]；中紀委機關報指出：「迷信是官員軟肋，在有的地方已經半公開化」^[66]。信仰是精神世界的支柱。信仰危機、信念危機標誌著人的精神支柱的軟化、衰頹、崩碎、坍塌。「善、勇氣和尊嚴都在我們中國人的心中，這在汶川地震時期我們都看到了，但這些品質轉瞬即逝，消失在空氣中，我們無能為力。也許我們只能在更小的尺度和方向上，去描述這種人類的正面力量，和這些正面情感有細小的相遇。我們無法莊嚴，無法宏闊，無法秩序井然」^[67]。信仰、信念的危機意味著內心約束的鬆弛，人民整體道德素質全面下滑。「部分社會成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有所滋長」，「見利忘義、誠信缺失等道德失範現象時有發生，封建迷信、黃賭毒等社會醜惡現象沉渣泛起」^[68]。近年，信仰危機、道德危機日益深化，進而引發孫立平所概況的「社會潰敗」：權力失控，潛規則通行於所有社會領域，逆淘汰成為普遍社會現象，職業操守、職業道德日益喪失，信息系統失真，強勢利益集團越來越肆無忌憚，社會生活出現黑社會化趨勢等。

其次，自我誤解，思想教條、僵化，直接影響、阻滯、干擾甚至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在中國知識體系逐步發展成為西方知識體系「真子集」的過程中，中國思想界、學術界逐步接受、認同一種來自西方文化的、有關人及其歷史的理論即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從而逐步形成了一種系統化、理論化的自我誤解：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人類社會發展是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必然歷史進程；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解放的近代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中華民族是當代世界的無產階級——異化的人；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這種自我誤解形成於特定世界歷史時期，曾對中國人具有很強解釋力，然而隨著歷史進程的展開，卻越來越脫離現實，中國人也不能不因自我誤解而付出沉重代價。其一，西方社會



在特定歷史時期（18世紀上半葉-19世紀中葉）的內部緊張——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直接轉化為中國文明社會從古到今的內部緊張：中華民族被人為地劃分為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的兩個相互敵對陣營，大量人民內部矛盾、黨內矛盾被歸結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敵我矛盾，造成無數「冤假錯案」並最終形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民族造成極大傷害。其二，冷戰期間兩個敵對國家陣營之間的尖銳矛盾——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尖銳矛盾，直接轉化為中國內部不同經濟形式之間的尖銳矛盾，一方面迷信計劃經濟、公有制，一方面否定市場經濟、私有制，壓制、打擊中國人民對自身物質利益的正當追求，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其三，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終身奮鬥目標，反復形成脫離中國實際的「左傾」思想路線，而且每一次「左傾」思想路線形成時都高居理論與道德的制高點，勢不可擋，不到局面不可收拾不會被糾正、反思。鄧小平曾萬分感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

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69]。其四，人的教育越來越成為中國的最大問題。教育是人的教與育。當代中國人的自我誤解不能不誤導中國教育，貽誤後人。目前，中國教育目標是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只能存在於書本概念的人、中國現實生活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人。中國憲法明言：「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並非「科學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在現實生活中，中國人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並非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脫離實際的教育目標導致教育問題的叢生：教育本應引導人的精神成長，鼓勵青年人追求真理、正義，實際上卻處處禁區、禁忌，束縛了人的思想，壓抑了人的精神；教育本應讓受教育者誠實守信，言行一致，實際上卻鼓勵心口不一、唯書唯上，以至培養出大量善於逢迎、配合、表演、利用體制追求個人私利的



「精緻利己主義者」。其五，中國政治現代化建設——繼承中國精英政治傳統的現代制度建設——成為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主要瓶頸。現代政治是以政黨政治為形式的民主政治，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來自代表不同階級、階層、社會集團利益的政黨之間的政黨競爭。中國政治秩序根植於中國人民世代傳延的公平合作理念，執政者與民眾的關係並非僅僅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還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負責治理社會的執政群體是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社會集團所一致認同的社會精英，代表社會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的共同利益。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動捲入西方主導的現代化進程，形成以政黨政治為形式的現代民主政治，因此也形成中國政治的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問題，即如何建立繼承中國精英政治傳統的現代政治秩序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之際，毛主席依據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歷史矛盾，運用階級、政黨、專政等西方政治術語，初步回答了繼承中國政治傳統的現代制度建設問題：「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70]。七十多年過去了，世界和中國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上沒有了侵略、壓迫中華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國內各個階級、階層、社會集團也都不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毛主席當年的論述過時了——這也顯示了毛主席當年論述中特別強調「在中國，在現階段」的嚴謹。但是，自我誤解仍是中國思想界的主流意識：「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剝削、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是作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工具，是新型的國家。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仍處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搏鬥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鬥爭的主線索，這

就決定了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人民民主專政是萬萬不可取消的。否則不足以抵制國外反動勢力對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資本主義化的圖謀，不足以壓制國內敵對力量裡應外合的破壞作用」^[71]。這就是說，目前中國還同一些國家處於敵我對立的政治狀態，中國國體仍有必要建構於一部分中國人對另一部分中國人的專政；中國社會還處於潛在戰爭狀態——還有一部分中國人是國家政權的敵人，還在處心積慮地要推翻國家政權；中國政治建設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運用一切手段來維護國家政權本身的安全，而不是如何依法治理已經處於和平狀態的、有序運行的社會；中國共產黨還不是名副其實的民族精英——包括中國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精英，「共產黨的領導」並未得全體中國人的認同。因此，儘管和平的國際環境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不可或缺的條件，自我誤解卻讓中國仍置身於冷戰世界；儘管實踐證明：在多數國家採取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當今世界，中國精英政治傳統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自我誤解卻無法將其轉化成為現代化的國家制度。

最後，自我喪失，文化衰落，中國現代化建設主體日益解體。千百年來，中國人之為中國人，就在於敘述君子信念的人的知識是滿足中國人精神需要的精神食糧，無論貧富貴賤，哪怕土匪強盜，都以「君子」為榮，小人為「恥」。中國知識體系成為西方知識體系「真子集」，中國文化的本體——敘述君子信念的知識——成為毫無根據的主觀觀念，中國教育傳授知識而不傳承中國文化，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特質 (Identity) 隨時間流逝而日益模糊。17世紀荷蘭思想家格老秀斯預言：「大同主義的體系構成其頂點，中國的精神文化能夠發展至此。唯一能夠銷蝕並阻撓它的力量是科學。如果人們嚴肅地從事科學的時代來到，那必定無疑出現中國全部精神生活中的一種完全變革，通過它，中國或者必定四分五裂或者將經歷再生，此後中國將不再是中國，中國人將不再是中國人」^[72]。毋庸諱言，他的預言正在成為現實。這也就意味著中國現代化建設主體的解體。中國現代化的主體

是中國人——以生命承載中國文化的人。正是一代代中國人的現代化追求，將現代科學技術運用於自己的生產與生活，讓原本封閉的中國逐步融入世界，古老的中國文明逐步成為自立於世界的現代文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還在進行中。放眼未來，一個現代化的中國究竟是怎樣的？現代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究竟是怎樣的？誰也無法預言。囿於西方文明產物的理念與制度——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一黨制與多黨制、自由民主與獨裁專制等，無論怎樣，中國的現代化都意味著中國的西方化，意味著中國現代化的失敗。但可以肯定，只要中國人仍是中國人——以自己生命承載中國文化的人，仍不斷努力將現代科學技術運用於中國的經濟生產與國家治理，中國的現代化就不可逆轉，中國文明就必定自立於當代文明世界。正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

正確認識、解答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種種問題，就必須重建中國文化的人的知識，讓中國人世世代代成為以自己生命承載中國文化的人。中國百年現代化追求給予我們最重要的經驗與教訓：相信自己，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就可以找到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國家就不斷發展，人民生活就會蒸蒸日上；脫離自己的實際，迷信、照搬他人的理論與經驗，國家就必然誤入歧途，人民就要付出沉重代價。因此，無論我們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遇到怎樣的複雜問題，只要我們始終保持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自覺、自信，發展、建設以中國文化的人的知識為基石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就都可以找到逐步解決問題的辦法。「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道德經·第三十三章》）。

中國文明要自立於當代人類文明，必須重建中國文化的人的知識，重建中國知識體系。冷戰結束，人類進入新的歷史時代。「『文化自覺』是當今時代的要求」^[73]。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人民，都應擁有屬於自己的人的知識，都有權利自己決定自己成為怎樣的人——中國人、西方人、印度人、俄羅斯人、日本人……。在多元文明並存的當今世界，人的知識已經成為國家主權的重要內容。「知識和權

力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誰決定知識是什麼？誰知道應該決定什麼？在信息時代，知識的問題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是統治的問題」^[74]。

重建中國知識體系，任重而道遠。當代中國知識體系在中國百年現代化進程中逐步形成，已是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牽一髮而動全身，改革難度並不亞於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更困難的是，重建中國知識體系，中國人就必須重新認識自己，重建中華民族的自我意識，必須面對並回答一個當代哲學仍在探索的古老哲學問題——認識你自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然而人不知物，可以很快知道自己不知道。人無自知，卻很難知道自己不知道，反而常常以為自己最知道。正所謂，人之患在不自知。人無自知，一切思想言行必然南轅北轍：自信就是自欺，自尊就意味著自負，自豪只是自傲，自珍自重就變為自高自大，自由自在就意味著自我放縱，自強不息就恰恰是自取滅亡……。一念之差，天上地下。智慧孕育於苦難。軸心時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期間）延續數百年的苦難，孕育了人類精神的重大突破，即蘇格拉底、耶穌、孔子、佛陀等思想家突破當時人類因囿於有關真理的片面認識而陷入的精神困境，在認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發現了真實的我，並以自己生命確證了新的思想範式——規範作為一切思想源泉的我的思想的真理性，從而形成適用於所有人類成員的「人」的觀念，確立從那以後的人類文明的精神核心，形成奠定當代文明格局的三種原創文明——中國文明、西方文明與印度文明。「艱難困苦，玉成於汝」。中國文明的偉大復興或許還需要中國人經歷更多苦難，正如一位當代中國政治家多年前所說：「我們可以一下子成為世界最好的國家嗎？難。我們恐怕還沒有吃夠苦頭，付出足夠的代價。簡單說，我們的路還很漫長」^[75]。「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1]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5頁。

- [2]同上。
- [3][古希臘]柏拉圖，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60頁。
- [4]李德順：《價值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20頁。
- [5][美]貝爾，高銛譯：《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第195頁。
- [6][美]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譯：《美國賴以立國之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6頁。
- [7][以色列]艾森斯塔特，曠新年、王愛松譯：《反思現代性》（三聯書店，2006年），第22頁。
- [8][美]羅爾斯，萬俊人譯：《政治自由主義》（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12-18頁。
- [9]金耀基：《金耀基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3頁。
- [10]同上。
- [11]同注[9]，第77-78頁。
- [12]溫家寶哈佛演講：「把目光投向中國」，2003-12-10。
- [13]金耀基：「中國二十一世紀的想像」，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43期。
- [14]張五常：《中國經濟制度》（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6、51頁。
- [15][美]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第9頁。
- [16]同上，第21頁。
- [17][美]特納，孫俊才、文軍譯：《人類情感》（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第13-21頁。
- [1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頁。
- [19][美]格爾茲，納日碧力戈譯：《文化的解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76頁。
- [20][英]布萊摩爾，耿海燕、李奇等校譯：《人的意識》（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8年），第155頁。
- [21]Lake, D,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Christian Belief: The Unresolved Conflict*, London: Methuen (1961); 轉移自：[澳]埃克爾斯，潘泓譯：《腦的進化——自我意識的創生》（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第284頁。
- [22][澳]埃克爾斯：《腦的進化——自我意識的創生》（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第239-271頁。
- [23]李秀林等主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第五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9、296頁。
- [24]同注[20]，第5頁。
- [25]同注[20]，第14-15頁。
- [26][美]侯世達，郭維德等譯：《哥德爾、埃舍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922-923頁。
- [27][德]雅斯貝爾斯，李雪濤譯：《大哲學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93頁。
- [28]同注[19]，第245頁。
- [29]同注[27]，第192頁。
- [30]同注[27]，第189頁。
- [31]同注[27]，第34頁。
- [32][法]利奧塔爾，車槿山譯：《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12-45頁。
- [33][美]格爾茲：《文化的解釋》（譯林出版社，1999年），第5頁。
- [34]同注[19]，第60頁。
- [35]同注[33]，第66頁。
- [36][意]達瓦馬尼，高秉江譯：《宗教現象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4-317頁。
- [37][德]盧克曼，單方明譯：《無形的宗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61頁。
- [38][美]約翰斯通，尹今黎、張蕾譯：《社會中的宗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頁。
- [39][德]西美爾，曹衛東等譯：《現代人與宗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頁。
- [40]參閱劉小楓選編：《舍勒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41]同注[1]，第203頁。
- [42]同注[27]，第194頁。
- [43][美]亨廷頓，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26頁。
- [44]同注[7]，第309頁。
- [45]《外國哲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第31、70頁。
- [46]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81年為致力和平而尊重自由。」

- [47]同注[7]，第273頁。
- [48]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41頁。
- [49][美]古德諾，蔡向陽、李茂增譯：《解析中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53頁。
- [50]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3-16頁。
- [51]金岳霖：「中國哲學」，載《哲學研究》，1985年第9期。
- [52]同注[9]，第78頁。
- [53]同注[8]，第14頁。
- [54]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學林出版社，1987年），第96頁。
- [55]《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92頁。
- [56]同注[32]，第12頁。
- [57]同注[32]，第12-13頁。
- [58]《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237頁。
- [5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學科分類與代碼表》，國家技術監督局，1992-11-01。
- [60]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 [61]鄭永年：《中國知識的重建》（東方出版社，2018年）。
- [62]凌斌：「走向開放的中國心智」，載《讀書》，2009年第1期。
- [63]同上。
- [64]孫立平：「經濟危機與社會潰敗」，在博客中國做客中國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國如何重建社會研討會上的發言，2009年2月26日。
- [65]廖申白、孫春晨：《倫理新視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343-348頁。
- [66]參閱中紀委機關報：2015-09-24。
- [67]艾偉：「中國當下的精神疑難」，載《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2期。
- [68]李長春在全國道德模範座談會暨第八屆中國公民道德論壇上的講話，載「人民網」，2011年9月20日。
- [69]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 [70]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 [71]王偉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載《紅旗文稿》，2014年第18期。

[72]轉引自《卡爾·雅斯貝斯文集》（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1頁。

[73][德]雅斯貝爾斯，李雪濤譯：《大哲學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80頁。費孝通：「經濟全球化和中國『三級兩跳』中的文化思考」，載於《光明日報》，2000年11月7日。

[74]同注[32]，第14頁。

[75]王岐山：「中國要成為世界最好恐怕還沒吃夠苦頭」，載「搜狐新聞」，2011.09.16。

Rebuilding China's Knowledge System

Jia Lu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retired)

Abstract: To live in the universe dominated by the law of material movement, man must master two kinds of knowledge, that is, scientific knowledge formed in objective cognition and human knowledge formed in subjective cognition. Human knowledge is the Noumenon of culture and the cornerston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The creator of culture combines wisdom and power to establish his spiritual discovery as the knowledge of a person of faith, and to gui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group from an animal to a human being. People grow up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become people with a certain Identity: Chinese, Westerners..... The noumenon of Chinese culture is the knowledge that narrates the gentleman's belief. Since the Opium War, the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True subset" of the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difficulty in recognizing their true selves, and have developed Morbid self-consciousness such as self-loss, self-misunderstanding and self-losing, has seriously affected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to construct the social sci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people, and to reconstruct the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which bears the Chinese culture. "Knowledge and power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question: Who decides what knowledge is? Who knows what should be decide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question of knowledge is more dominant than ever before."

Key Words: human knowledge, self, culture,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